

从三中全会公报看企业改革四大亮点

李锦 / 文

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已经公布,此次企业改革有 4 大看点。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从这次三中全会公报看,企业改革不是重点,从大的方面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这些都与企业改革有关。从具体内容看,有四个看点。

亮点一

第一次提出“两个都是”的重要思想,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此次三中全会首次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者并列进一步提升了非公经济的地位,对民营经济明显利好,预示着未来 5—10 年将是民营经济的黄金发展期,民营企业大发展时期即将到来。

可以理解,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自然资源等特殊行业不能放开外,其他行业只要满足市场条件,国有经济就会有序进退、有序调整,此时民营经济会有序进入、有序发

展。最终实现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形成我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支撑。

亮点二

混合所有制被抬到突出位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了十八大“两个毫不动摇”的提法。显然,不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这预示将有很多央企和民企结合在一起。混合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有机的融合,将有利于民企以大企业为龙头,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个机遇。要想把民间资本引入到正规的投资渠道中来,成立基金非常必要。通过基金来聚集分散的民间资本,通过团队专业管理去实现稳健收益,这将

亮点三

引入民营经济活力,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新内容。在《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过程中,国企改革引入民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2 年 5 月 25 日,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在发展为股权多元化公司,探索完善国有产权、股权流转机制过程中,民营经济活力将被引入国企改革中。

亮点四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句话放在混合所有制前面,有控股权掌握在国有经济范围内的意思。此次全会特别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民资入股国企的促进和推动。现行企业改革的若干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资产产权主体不明,产权不清,交易市场和规则不完善有关。因此,产权制度创新是重构混合所有制的基础,是进行制度创新,以及战略性布局整合和深化资产结构调整的关键。

这次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同原来提出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现在提出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任务,其目的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我们理解是国有企业的控股,使控制权掌握在国有经济控制权力范围内;二是对民营经济产权保护,促进两种经济相融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郑风田 / 文

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二以”到“四位一体”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来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我国城乡巨大差距的核心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结果,未来应该改变目前不平等的要素单向流动,允许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实行城乡互动的双重循环,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日前,众人关注、期望很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文公报正式发布,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需再等时日,但大政方针已现。公报提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纵观公报全文,在三农方面又有哪些重要政策进展呢?

其一继续重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其实已提了数年,尤其是上届三中全会,对土地政策迈出的步子很大,如给予农民长久的承包土地权等等。时光已过去五年,目前的确权颁证工作还没有完全解决,最新的一号文件相关部门给出的时间是五年,可见这个工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难度。如何真正落实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还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政策来推动。有关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能否真正做到同地同权同利,虽然各地已进行了诸多试点,如果没有全国性的纲领性文件,城乡统一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其二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二以”到“四位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公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过去在新城乡关系,重点关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这次改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由过去的二句话变动四句话: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把以工补农变成一工促农,从原来的被动变成主动,而增加的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能够更完成

地构画出工农城乡关系,他们是一体,是需要双方互相帮助,而不是过去单向的帮助。

其三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这个内容也是此次公报三农方面最大的亮点。农民目前的整体收入中,来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足 3%,这和农民拥有的巨量财产其实是不相适应的。农民拥有 18 亿亩耕地,还有 2.5 亿亩的非农建设用地,这个非农建设用地与城乡非农建设用地数量相当,但由于各种制度障碍,农村巨大的土地资产,目前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还没有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农民在农村的房子在家让老鼠住,自己在城里打工却只能住老鼠窝。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不能进行抵押贷款,城市资金进入不了农村,农民只能陷入衰落之中。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应该打破目前的各种障碍,让农民的财产真正为农民带来收益。农民拥有的最大的资产是土地,通过确权颁证,应该允许农民进行抵押贷款,进行出租转让。应该逐

步缩小征地范围与面积,允许农民带地迈向工业化与城镇化。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珠三角农民建设工厂用来出租出借,至今不但继续拥有增值后的土地与厂房,而且还得到巨大的借金分红。而后来全国一刀切的强制性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受益的只是地方政府与老板。仅征地一项,改革开放后几十万亩的土地增值收益离开农村,农民却受益不多。未来应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城乡要到平等交换也有很大的政策改进空间。我国城乡巨大差距的核心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结果,未来应该改变目前不平等的要素单向流动,允许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实行城乡互动的双重循环,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城乡二元结构是目前制约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也是我国城乡差距愈来愈大的主因,这种制度不但使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而且形成一个巨大的抽水机系统,单向地把农村生产要素抽向城市:每年高考,数百万的农村青年通过考学离开农村,每年还有近千万的农村青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离开

农村到城市及沿海地区打工,这些人力资源的输出几乎是单向的,回归的比例极低;另外农村大量的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及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网点输向城市,而农村居民因为主要财产承包地与宅基地难以进行抵押从而很难得到金融贷款;农村每年大量的土地被低价征收用于工业与城市建设,而给予农民的补偿却极低。目前巨大的城乡公共服务“势差”更加剧农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单向地流入到城市,农村失血比造血多,长此以往,只能造成城市畸形繁荣,农村陷入衰落。

过去几千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一直不大,主要原因是城乡双重循环制度在起作用。中国特有的科举制度让农村的有志青年通过赶考流到城市,退休之后一般还会告老返乡,解甲归田,置数亩良田,成为乡绅。这种城乡的人力双重循环使乡村不至于陷入衰落。我国目前出现的空心村等农村衰落现象都是因为单向的资源流动造成的,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让城乡要素实现平等交换,城乡互动,实现城乡双重循环回复的链接,让城里的人力、物力、财才能够向乡村转移,从而真正地实现城乡一体化梦想。

人口红利将结束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呼之欲出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将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方案将于 11 月 13 日或 14 日公布。卫计委相关人士 14 日对上述言论予以否认,表示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文件还没有见到,至于何时公布,他们也在密切关注中。不过,有消息人士透露,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能不久就会出台。目前社会关注的是,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一旦出台,会带来哪些影响。

人口红利 2013 年将结束

“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随着“单独二胎”政策近日即将施行的期待逐渐升温,有媒体报道称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方案将于三中全会后不久公布。对此,卫计委相关人士 14 日公开表示,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文件还没出台,更没确定。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能不久就会出台。

尽管政策最终以何种形式落地还不确定,但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其中原因无一不指向一个日益明晰的事实——人口红利的消失。

“到 2013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 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根据测算,2013 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些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此外,人口红利计算还依赖于在每个年龄段中的消费量到底有多大。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从历史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2 年至 2000 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

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人均产出贡献在 15%以上;第二阶段是 2000 年至 2013 年,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 2050 年,人口红利为负。

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 GDP 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 1995 年至 2010 年平均 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 7.6%。“如果现在不调,可能失去最后一次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机会,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由于人口从出生到成长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生育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早年出生的大量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由于劳动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减速期,如果中国维持目前 1.63 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未来 10 年出现下滑。澳新银行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减速的风险,但一些相对容易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能够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其中的一项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 1980 年开始实行的,当时提到 30 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蔡昉表示,“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 1.4 的水平,已



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婴儿潮”难以显现

调整生育政策是否会造成“生育反弹”?多家机构测算,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相反,只有尽快调整,才能避免中国过早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蔡昉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内地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果。”他认为,根据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中国即便放开生育控制,也不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通过政策调整把生育率提高到更加接近于更替水平(如 1.77 至 1.94),是一种更为乐观的设想。

而根据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小组预测,假设第一步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在全国推行“单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只要一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

二胎;第二步从 2016 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二胎化政策,即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在这种“改革情景”下,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可以从目前的 1.45 在五年内逐步上升到 1.66。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仅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带来婴儿潮,未来十年内中国仅仅增加 900 万至 1500 万婴儿。但政策放松,却能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刘利刚认为,如果目前的政策没有变化,同时生育率保持在 1.63 的水平,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的 10 年至 12 年内见顶。但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总人口将在 2030 年附近见顶,即晚于基准情形大约 5 年的时间,因此,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劳动力人口下降过于迅速。

将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中国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为 2030 年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对 GDP 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 1.77 至 1.94 并进一步保持的情况下,2031 年至 2035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7.1%至 11.8%,2046 年至 2050 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 15.5%至 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 1.77 至 1.94 的水

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他说。

但是,这样的政策变化可能对某些行业带来直接的影响,可能将使婴儿和儿童相关行业和产品,如奶粉、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明显受益。

此外,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 15 年至 20 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可能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

“事实上,我们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马骏的研究团队研究表明,短期来看,可以明显提高婴儿和儿童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今后几年出生的人口在 2030 年左右将成为劳动力,在‘两步走改革’情景下,2030 年至 2050 年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 0.2 个百分点。”

另外,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将在未来增加养老金的缴费人数,因此可略微缓解养老金缺口的压力。马骏团队的城镇职工养老金模型显示,与基准情景(假设养老金体制和人口政策不变的情景)相比,放松一胎化政策的“两步走改革”可以将 2040 年至 2050 年间的基本养老金缺口(不考虑利息支出)的规模减小约 4%。但马骏同时指出,仅仅靠放松一胎政策来化解养老金缺口肯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养老金改革应该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向社保划拔国企股份、调整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相对规模、鼓励商业性养老保险等。

(来源:腾讯财经)